

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思维变革 与路径重塑

徐秀军

摘 要 新冠疫情大流行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对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造成重大冲击。面对未来更多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要跳出依靠自我调节的稳态思维、割裂整体与部分关系的碎片化思维，摒弃人为制造差异的等级制思维，适应全球形势的非稳态和系统性变化，并以去中心化思维看待全球化进程和历史发展大势。新冠疫情大流行为重塑全球治理路径提供了历史机遇。从价值上看，全球治理要从维护西方价值迈向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从模式上看，全球治理要从大国治理迈向全球共治；从制度上看，全球治理要从注重功能治理迈向注重系统治理；从手段上看，全球治理要从侧重市场逻辑迈向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的协同。这既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的全球治理方案。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 全球治理 新冠疫情 全球化 国际社会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全球安全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世界向何处去、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

* 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北京 100732）。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1ZDA096）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孙吉胜教授、朱杰进教授以及《外交评论》评审专家的有益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是衰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的时代之问。^① 这些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之问，也引发我们对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何去何从的思考。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瑞典病理学家福克·亨申就在考察人类疾病的起源和地理分布后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其疾病的历史”。^②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大流行不仅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和健康，还深刻影响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一些重大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甚至比暴动和战争更为惨烈和深远。^③ 从公元前 430—前 427 年在雅典发生的瘟疫，到 1347—1352 年间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再到 1918—1919 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无不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导致大国关系深刻变化。如今，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大流行无疑将成为深刻影响全人类的又一重大事件。“疫情不仅是对各国执政能力的大考，也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检验。”^④

对全球治理的研究者来说，新冠疫情大流行更是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有学者认为，新冠疫情大流行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⑤ 但从全球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来看，新冠疫情大流行给全球治理带来的影响仍不可小觑。在治理主体上，新冠疫情大流行凸显了现有国际组织的弊端，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也面临重大挑战。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反应失灵、行动迟缓，大国间协调与合作的难度也在加大。^⑥ 疫情期间，全球治理的权威让位于国家行政权威，在疫情结束前乃至结束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都将处于弱势地位。^⑦ 也有学者认为，国际组织的疲软表现使得国家治理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彰显。^⑧ 在治理领域上，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公共卫生治理为先导，凸显了日益扩大的全球治理赤字。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全球公共卫

① 习近平：《把握时代潮流，缔造光明未来——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22 年 6 月 22 日），《人民日报》，2022 年 6 月 23 日，第 2 版。

② Folke Henschen,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Diseases*, translated by Joan Tate, Delacorte Press, 1966.

③ 王文：《传染病与大国兴衰——基于历史实例的研究》，《政治学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136—148 页。

④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2020 年 9 月 22 日），《人民日报》，2020 年 9 月 23 日，第 3 版。

⑤ 张宇燕、倪峰、杨伯江、冯仲平：《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4 期，第 4—26 页。

⑥ 孙吉胜：《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治理变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5 期，第 82—87 页。

⑦ 赵可金：《病毒与权力：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世界权威重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10 期，第 30—49 页。

⑧ 康晓：《新冠疫情危机与全球治理新态势》，《国际论坛》，2021 年第 2 期，第 23—28 页。

生危机的应对远远超出卫生领域，对各个民族国家和不同功能领域国际机构间的协调提出了更高要求。^① 在治理路径上，发达国家主导的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并发生新的变革。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呈现多边停滞、瓦解和重塑之势，这些特点仍将延续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会加强。^② 有学者认为，疫情导致多边治理退缩和经济民族主义崛起，世界性自由主义退却而专制民粹主义崛起，以及私人和自发治理的兴起。^③ 还有学者认为，以区域为单位的治理结构将在全球层面治理面临阻碍时发挥更大作用。^④ 因此，国际格局更趋于“无极化”，西方大国的“再国家化”也将加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作用将更为重要。^⑤ 随着美国霸权日渐走弱、权力逐渐下沉和分散，全球治理趋向于扁平，一个更具活力和灵活性的，以多层次、多领域和多主体为基本特征的复合治理网络将会建立。^⑥

毋庸置疑，随疫情发展而涌现的全球问题更加复杂、影响更加深远。无论疫情何时结束，全球治理都难以甚至不可能退回到疫情之前。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思考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面临的冲击和挑战、总结经验与教训，是摆在中国和国际社会面前的紧迫议程和重要任务。

一、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全球治理的冲击

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影响广泛涉及个人健康、家庭幸福、社会环境、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等各个层面，已成为足以载入史册的全球危机。疫情发生后，全球经济增长分化加速扩大，国内政治极化和国际政治分歧日益普遍，

① 晋继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全球卫生治理——以世界卫生组织改革为主线》，《外交评论》，2020年第3期，第23—44页；熊爱宗：《新冠肺炎疫情下世界卫生组织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6期，第159—176页。Lawrence O. Gostin, Suerie Moon, and Benjamin Mason Meier, “Reimagining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in the Age of COVID-19”,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 110, No 11, 2020, pp 1615-1619.

② 任琳：《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秩序与中国应对》，《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第112—123页。

③ David L. Levy, “COVID-19 and Glob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 58, No 2, 2021, pp 562-566.

④ 张云：《新冠疫情下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与中国的战略选项》，《当代亚太》，2020年第3期，第141—165页；马丁·雅克：《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全球治理》，《环球时报》，2020年9月30日，第14版。

⑤ 叶江：《新冠肺炎疫情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影响——兼谈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中的新作用》，《国际展望》，2021年第1期，第57—62页。

⑥ 秦亚青：《全球治理趋向扁平》，《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5期，第55—72页。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际社会则不断深化对新冠疫情冲击的性质与表现的认识，为各国制定应对举措奠定了基础。

（一）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增加

与很多全球问题不同的是，新冠疫情具有很强的突发性，不仅难以预计，而且还在短时期内发展成为难以控制的全球大流行病。在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严重衰退，全球可持续发展成果遭受重大打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显示，2020 年全球经济较上年萎缩 3.1%，创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低增长水平。^① 由于疫情大流行暴发，全球失业率和贫困率上升，2020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的平均分出现了自 2015 年该目标通过以来的首次下降。^②

同时，疫情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冲击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加剧了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非理性博弈，引发了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和国际政治秩序不稳定。作为两个在国际体系中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美关系在疫情背景下持续发生深刻变化。马凯硕认为，新冠疫情加速了早已开始的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并推进全球化中心加速从美国转向中国。^③ 在疫情的巨大冲击下，美国政府为转移国内矛盾，不断煽动国内反华势力，对华战略也更具竞争性和挑衅性，中美之间的对抗情绪从政府层面扩大到社会层面，两国在抗疫背后的地缘和战略竞争日益凸显。对此，亚当·波森指出，疫情可能导致中美关系进一步“脱钩”，并使疫后世界变得更加分裂。在此背景下，大国关系加速分化组合，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充满更多不确定性。

在一些学者看来，新冠疫情大流行将会永久性地改写历史进程、改变世界秩序。^④ 库尔特·坎贝尔和杜如松指出，美国在疫情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预示其全球威信和领导力快速下降，如果不采取积极行动，疫情的蔓延将成为美国的“苏伊士时刻”。^⑤ 目前，疫情正在加速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世

①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r Sets Back the Global Recovery*, Washington, D. C.: IMF, 2022, p. 7.

② Jeffrey D. Sachs et 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21: The Decade of Ac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13.

③ Kishore Mahbubani, “A More China-Centric Globalization”, *Foreign Policy*, No. 236, 2020, p. 10.

④ Henry A. Kissing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ill Forever Alter the World Ord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3, 2020, <https://www.henryakissinger.com/articles/the-coronavirus-pandemic-will-forever-alter-the-world-order/>.

⑤ Kurt M. Campbell and Rush Doshi, “The Coronavirus Could Reshape Global Order; China Is Maneuvering for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s the United States Falter”, *Foreign Affairs*, Mar 18,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3-18/coronavirus-could-reshape-global-order>.

界秩序会否在经过逐步的量变后迎来突然的质变，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二）“逆全球化”挑战加大

在一些学者看来，新冠疫情大流行并未改变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开启的历史进程，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特定方式在某些方面加速或延缓了这一进程，并且疫情作用于现行历史进程的加速力或迟滞力突出体现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形成的世界产业链的“客观”断裂上。^① 其实，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并不仅仅局限于客观维度。疫情迫使很多国家不得不采取应对产业链断裂的内顾政策，这些政策与少数大国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交织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脱钩”政策的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调整的全面重组和回缩。

尼古拉斯·艾伯斯塔德认为，疫情将使战略自主性成为重组供应链的首要考量。他指出，尽管全球化进程不会停止，但全球商业、金融和治理秩序已经无法回到原有轨道，国家利益和经济民族主义卷土重来，全球供应链被打破，产业付出高昂代价回归本土，零售业等旧有的商业模式会被颠覆。^② 威廉·雷恩斯认为，疫情后全球供应链的结构将出现永久性变化，从长远来看，会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支付高昂成本来重建其供应链的弹性和安全性，使供应链变得更短，更接近本国或最终市场。^③

因此，疫情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导致全球化的新一轮倒退。布雷默认为，疫情后去全球化和缺乏合作将成为世界新秩序的特征，民粹主义与本国优先将成为政治新常态，各国企业优先考虑国家利益，被迫重构产业链，将生产转回国内。^④ 总体来看，虽然新冠疫情大流行并不是去全球化的动力，但它却为去全球化策略提供了合理性。^⑤ 而从根源上讲，逆全球化挑战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不匹配引发全球治理失灵的结果。^⑥

① 张宇燕：《新冠疫情与世界格局》，《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4 期，第 5—6 页。

② Nicholas Eberstadt, “The New Normal: Thoughts about 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in the Post-Pandemic World”,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April 18, 2020,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the-new-normal-thoughts-about-the-shape-of-things-to-come-in-the-post-pandemic-world/>.

③ William Alan Reinsch, “Pandemic Pandemonium: How the Virus Could Change the Trading System”,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2, 202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andemic-pandemonium-how-virus-could-change-trading-system>.

④ Ian Bremmer, “Coronavirus and the World Order to Come”, *Horiz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 16, 2020, pp. 14-23.

⑤ 阎学通：《新冠肺炎疫情为去全球化提供合理性》，《国际政治科学》，2020 年第 3 期，第 III—VI 页。

⑥ 陈伟光：《全球化逆动与中国的应对：基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关系的思考》，《教学与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72—82 页。

(三) 全球各种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潮相互激荡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的深刻性和全面性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和国际体系等各个领域。目前来看，新冠疫情的影响早已不局限于公共卫生与健康领域，而不断向其他领域渗透和溢出。从最初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到引发全球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的“新冠疫情危机”，再到如同柏林墙倒塌或雷曼兄弟倒闭一般导致政治经济权力永久转移的世界大事件，都深刻反映出人们对后疫情时代全球变局的畏惧和担忧。^① 随着疫情影响在全球的不断扩散和蔓延，人们的认知和争论还将不断呈现新的动向，加剧全球范围内各种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潮的碰撞。

约翰·伊肯伯里认为，这场疫情将为西方大战略辩论中的不同阵营注入动力，民族主义者、反全球主义者、对华鹰派甚至自由国际主义者都将看到证明他们观点紧迫性的新证据。随着经济衰退和社会崩溃，除民族主义、大国对抗、战略脱钩等类似趋势得到强化外，很难再看到其他任何东西。^② 迪米特里·叶夫斯塔菲耶夫也称，疫情凸显了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之间存在的竞争，可能导致国际主流文化解体，以及美国让渡在思想领域的领导权。^③ 托马斯·弗里德曼则借用“紧密社会”和“松散社会”的文化差异理论，来理解不同国家抗击疫情所采取的方式。^④ 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等紧密型社会更重视规则，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多遭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大瘟疫，探索出了一套严密的规则和秩序来挽救生命。而美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国则盛行松散文化，几乎没有受过大规模灾害威胁，往往更重视自由而弱化规则。疫情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碰撞也将日益凸显。

① 2020 年 3 月和 12 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分别邀请了 12 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评估和预测新冠疫情大流行后的全球秩序。在两次讨论中，学者们关注的话题越来越广泛，且大都认为，正如病毒破坏生活、扰乱经济、改变选举结果一样，疫情将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永久性转变。参见 Stephen M. Walt et al., “After the Coronavirus”, *Foreign Policy*, No. 236, 2020, p. 9-13; John R. Allen et al., “After the Coronavirus”, *Foreign Policy*, No. 239, 2021, pp. 111-115.

② G. John Ikenberry, “Democracies Will Come Out of Their Shell”, *Foreign Policy*, No. 236, 2020, p. 11.

③ Дмитрий Евстафьев: «Пандемия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путь туда, но не обратно», «Эксперт», № 15, 6 апреля 2020 г.

④ Thomas Loren Friedman, “Our New Historical Divide: B.C. and A.C. —The World Before Corona and the World After”,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7/opinion/corona-virus-trends.html>. 关于“紧密社会”(tight society)和“松散社会”(loose society)，参见 Michele Gelfand, *Rule Makers, Rule Breakers: How Tight and Loose Cultures Wire Our World*, Scribner, 2018.

二、新冠疫情大流行与全球治理思维变革

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些问题的特点、性质和影响，并找到更符合现实需要的应对之策，人们需要调整和转换认知思维，进行全球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概括而言，新冠疫情大流行后，全球治理已经或者需要进行如下四个方面的思维变革。

（一）从稳态思维治理到非稳态思维治理

通常情况下，无论是生物有机体还是社会有机体，都是一种稳态（homeostasis）结构。稳态原指生物有机体通过正常的调节作用让各个器官与系统协调活动并共同维持内环境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①因此，稳态是不断变化又相对稳定的状态，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扩展到社会领域，稳态系统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有自我生存和调节能力的进化系统”。^②再扩展到国际社会，稳态主要是指包括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系统的国际社会系统处于规范有序、动态平衡的连续运行状态。

处于稳态的国际体系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规范性。规范性意味着规则得到普遍适用。现代国际体系是伴随着一系列条约和协议、通行的国际惯例和准则以及协调国际关系的国际机构等制度和规则的建立而形成的。国际体系的每一次重大调整与变革都意味着一系列旧的国际规则的废止和失效，以及新的国际规则制定并得到执行和遵守。二是有序性。有序性意味着国际秩序保持总体稳定。在现代国际体系形成后的大部分时期内，尽管国际社会各种国际矛盾和跨国问题不断涌现，甚至出现国际危机与冲突，但国际社会总体仍是一种稳定可控的稳态结构。三是动态性。动态性意味着影响国际体系演进的各种力量与因素总是处于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之中，但这种演进并不会带来剧烈的或本质的变化。自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治理兴起^③以来，对于各种矛盾与问题的治理，往往不需要考虑短期内的剧烈变化，而是遵循稳态

① Walter B. Cannon, *The Wisdom of The Body*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63, pp. 305-324.

② 杨桂华：《论社会系统的稳态机制》，《理论与现代化》，1998 年第 5 期，第 25 页。

③ 1995 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布报告界定全球治理概念后，这一概念才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公认，因此，一般也将 20 世纪 90 年代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的起点。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urhood: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apter 1.

思维治理的逻辑。^① 在稳态思维治理模式下, 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尤其是主要成员能够遵循国际规则, 维护现有国际秩序, 从而保障国际社会的协调有序。

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发生, 使稳态治理思维受到冲击, 并使国际体系呈现更多非稳态 (non-homeostasis) 特征。非稳态是一种突变过程,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新冠疫情大流行在如下两个维度改变了人们对原有国际体系的认知: 一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全球问题的诱导效应。一方面, 疫情直接引发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给人类生命健康构成严峻威胁; 另一方面, 由于疫情冲击具有很强的溢出性, 很多国家正常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干扰, 乃至陷入失序状态。二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全球问题的叠加效应。大流行的发生正值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各种国际矛盾和全球问题已累积到较高水平。尽管疫情可能不会成为改变现有国际体系的主要因素, 但它使大变局加速演进, 并由此成为推动世界变局的重大事件。基于以上两方面的效应, 新冠疫情大流行既造成现有国际体系剧烈变化, 又使现有国际体系面临更大变局。

新冠疫情的大流行, 使全球问题和风险具有高度可变性和超预期性, 并因此对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可预见的未来, 像新冠疫情大流行这样可在短期内给全人类造成巨大冲击的全球问题很可能不是孤例。除了可能暴发新的疫情全球大流行外, 还有很多领域的问题也将会加速恶化并引发更加严重的全球性危机。尤其是人类活动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和生物灭绝进程加速, 一旦超过维持生态平衡的临界值, 其所构成的全球性威胁与挑战将呈几何级数增长。对此, 来自全球 153 个国家的 1.1 万余名科学家联名发文表示担忧。^②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显示, 2011—2020 年全球地表温度较 1850—1900 年升高了 1.09℃, 创 12.5 万年前冰河时代以来的最快水平。^③ 如果世界各国仍然漠视正在加速演进的各种变化, 未来全球将会面临更多超出人类能力控制的危机。由此可见, 未来的全球治理将在越来越多问题领域遵循非稳态思维的治理逻辑。反映在全球治理规则上, 既要充分发挥其功能和效用, 也要对规则的破坏和重大变革

① 尽管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 但对整个国际体系来说, 其影响主要反映在金融和经济领域, 并未造成国际体系的重大调整与变革。

② William J. Ripple et al, "World Scientists' Warning of a Climate Emergency", *BioScience*, Vol 70, No 1, 2020, pp. 8-12.

③ IPCC, *Climate Change 2021: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213.

未雨绸缪、做好准备。

（二）从碎片化思维治理到系统性思维治理

全球治理“碎片化”和治理形态多样性是与全球治理研究相关的基本问题之一。^①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全球治理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全球治理也由此开启了大国主导的碎片化进程。2009年，奥巴马宣布美国将正式加入TPP谈判进程。^②2010年3月，美国同其他各方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首轮TPP谈判。美国主导的TPP协定在区域和全球两个维度助推了经贸治理的碎片化进程。作为一项地区性经贸协定，TPP并未根据地域原则向亚太地区所有成员开放，而是通过邀请和所谓“一致同意”原则将亚太地区很多重要经济体排除在外，从而导致亚太地区成员间的分裂。尤其对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东盟，只有部分成员加入TPP谈判，从而在事实上被分裂为两个部分。同时，美国主导TPP的一个意图在于借此塑造未来的全球贸易。这种利用地区协定构筑全球规则的做法本身就是对已有多边平台的损害，因而也不可能取得成功。特朗普在上台后退出了TPP协议，但转向了更为极端的单边主义，退出一系列多边协定和多边机构，致使全球治理陷入更严重的碎片化困境。在一定意义上，新冠疫情大流行也是全球治理碎片化的必然产物。

新冠疫情发生后，全球治理的碎片化趋势更加凸显。其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区域化、本土化趋势加强，并且随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全球化可能回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有限全球化”，回归“经济主权时代”。^③这种全球治理的困境反映出全球治理碎片化思维的两大误区：一是割裂了全球问题之间的联动性。疫情本身只属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但如果仅从这一点出发看待疫情，就无法理解全球抗疫当中的政治化、污名化。当今世界的重大国际事件，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等领域高度关联、相互渗透，而且会形成合力影响国际秩序演变。二是过于倚重全球问题的地方化应对。新冠疫情防控的实践表明，缺乏有效的多边合作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应对，疫情是难以战胜的。保护主义无法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部复杂精巧、有机一体的机器，拆掉一

^① 张宇燕、任琳：《全球治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3期，第22—24页。

^② 早在2008年9月，时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施瓦布就公开表示，美国在考虑于2009年开始参与TPP框架下的自由贸易谈判。

^③ 郑永年：《全球可能会退回经济主权时代》，《浙商》，2020年第7期，第23页；胡志勇：《世界经济格局将因疫情影响加速转型》，《经济日报》，2020年7月14日，第8版。

个零部件就会使整个机器运转面临严重困难，被拆的人会受损，拆的人也会受损。^①这是全球治理系统性的生动写照。当前，全球抗疫合作效果不佳的事实给未来全球治理带来的启示是，应对全球问题必须要有系统性思维。一方面，全球治理议题领域存在高度联动性，需要增强某一议题领域问题的系统性应对。恰如新冠疫情大流行，其影响远远超出公共卫生治理，并向经济、社会、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溢出。正因如此，仅靠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各国卫生部门无法有效开展疫情防控、应对疫情冲击，而需要在国际上进行系统性应对，加强各功能机制之间以及国内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另一方面，国家和地区内部问题存在高度联动性，需要加强某一国家和地区问题的系统性应对。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高度相互依存，某一国家和地区内部的问题与危机很可能迅速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蔓延，从而引发更大范围、更大影响的问题与危机。新冠病毒之所以引发全球大流行，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国家和地区内部问题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

（三）从等级制思维治理到去中心化思维治理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世界上不存在超越国家之上的中央权力，也在理论上赋予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早在 16 世纪 80 年代，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博丹就系统提出了国家主权学说，认为主权是指对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外具有独立平等的权力。^②这一学说为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思想支撑。然而，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一些行为体利用某种权威影响其他行为体行为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当某个行为体对其他行为体拥有权威时，就在两者之间产生了等级关系，并因此形成了国际等级制。^③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主导建立的。在这一体系中，只有少数国家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绝大部分国家都只是现有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全球化因此形成了以规则为基础的中心—外围结构。不同国家享有的权利和获得的利益各不相同，并与各自所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不相匹配。总体来看，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少数国家主导的等级制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主导国家往往抱持等级制思维推进全球治理，习惯于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推责追责，致使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公平性和合法性逐步丧失。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已开启了“去中心化”的历史进程，

① 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2 日，第 2 版。

② Jean Bodin, *On Sovereignty: 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 abridged and translated by M. J. Tooley, Seven Treasures Publications, 2009, pp. 65-75.

③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5-62.

世界逐步进入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时代，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开始下降。由于国际力量“东升西降”，从整个国际关系史来看偶然存在的“超级大国”现象将不复存在，世界政治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去中心的全球治理，并产生更加注重合作共赢的国际社会。^①“去中心化”意味着全球转型的配置不再集中于一小部分国家，而呈现越来越分散的方式。与以往相比，支撑全球化的权力模式少了不均匀的集中，多了相互制衡的力量组合。^②

长期以来，信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加大了国家财富与实力的分化。大国在全球治理网络中占据节点位置，并在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中建构了强大的权力。^③为此，位居产业链下游的国家往往能够实现对外上游国家的控制。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供应链断裂表明，处于不同阶段的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全球产业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全球危机爆发时，原料和原材料供应以及位于产业链中下游的日用品制造同样能够成为国家之间竞争与博弈的“武器”。由于产业链的扁平化，上游与下游只是产业链的位置不同，并非重要性有高有低。位于产业链不同位置的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只能是彼此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所以，新冠疫情大流行暴露出等级制思维治理的弊端，加速了全球的去中心化进程。不同地区与国家都会暂时退回本土区域，反思经济全球化给本土带来的冲击与威胁。^④当前，全球抗疫合作的领导者缺失或许正是全球治理“去中心化”加速的反映，未来全球治理可能将不再依靠个别或少数国家担当领导角色，而更多表现为建立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的协商治理。

三、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路径重塑

新冠疫情大流行是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建立以来对全球影响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全球抗疫合作中暴露的诸多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反思价值，并给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改革与创新提供了许多新的启示。在疫情对全球化深远

^① Barry Buzan, “A World Order Without Superpowers: Decentred Glob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5, No 1, 2011, pp 3-25.

^②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73-304.

^③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1, 2019, pp 42-79.

^④ 张云：《新冠疫情下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与中国的战略选项》，《当代亚太》，2020年第3期，第141—165页。

影响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关于全球治理的新认知既要能够为全球疫情治理中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各种乱象提供合理解释，更要为未来的全球治理实践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引。

从构成要素来看，全球治理一般包括价值、规制、主体或基本单元、对象或客体以及结果等五个方面。^①但如果将全球治理理解为制度公共产品的供给，其构成要素便都将通过制度和规则的形式反映出来。基于这种考虑和疫情带来的变化，下面从中国视角出发并立足全球治理的价值、模式、制度、手段四个基本要素探讨全球治理新路径，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提供新的启示。

（一）全球治理价值：西方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

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关乎全球治理的终极目标，也是理解全球治理为何失灵所不可避免的基本问题。在国际层面，相比二战之前应对国际危机和挑战的各种制度安排来说，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很大的进步性。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主导和参与建立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行为体限于少数国际社会成员，且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这使得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基础主要来源于西方，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益。在这些国家的主导下，全球治理日益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全球治理的政治化。长期以来，一些国家将全球治理作为国家之间竞争与博弈的场所。在全球问题的应对上，讲求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尽力逃避和推卸义务和责任，不择手段争夺话语权和规则制订权，使全球治理缺失合作性和包容性。这种情况在全球抗疫中颇为常见。在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大流行面前，一些国家不顾病毒才是全人类共同敌人的基本事实，不仅不集中资源投入全球抗疫合作，还在国际社会大搞病毒溯源政治化、疫情防控政治化、疫苗分配政治化，使全球抗疫面临更大障碍和挑战。二是全球治理的工具化。在部分国家看来，全球治理是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因此，它们对通行国际规则和各种全球治理机制，要么奉行“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原则，频频毁约退群，严重削弱全球治理规则和机制的权威和效力，要么奉行双重标准，对本国和他国实行不同标准、对盟友和非盟友实行不同标准，党同伐异、打压异己，严重破坏了全球治理的公平与正义。

新冠疫情大流行的事实表明，西方价值不可能成为普世价值，不能反映人类共同的需求与利益，也不可能使全球治理发挥应有的效能。在西方价值主导下，一些国家的全球治理行动与全球治理的应有目标完全背离，不仅割

^① 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 年第 1 期，第 25—27 页。

裂了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关系，还将两者对立起来，因而只会带来更多的利益冲突和不断增加的全球治理赤字。为此，实现全球善治，必须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应对全球问题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①用一种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否定了价值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反映的是维护一种价值的利益。共同价值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群体价值的共同部分，根本目标是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可见，西方价值不能担负指引全球治理迈向美好未来的责任，建立在西方价值基础上的全球治理理论，不可能指导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实践。新时代的全球治理必须服务全人类共同利益，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

（二）全球治理模式：大国治理与全球共治

在世界历史中，大国长期占据国际关系的主角地位。这种现象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得到了系统阐述：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不可避免。国家利益的实现取决于国家实力或权力的大小。^②这似乎是“国际政治的铁律”。即便一些理论淡化国际关系的权力色彩，强调制度、文化、观念、道德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但国家权力以及作为这些因素载体的大国始终都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全球治理领域，大国的作用和贡献显而易见。现行所有重要全球治理机制都是大国主导建立的。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到二十国集团等非正式机制，其成立和运行都反映出大国是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大国之所以在全球治理中长期发挥主要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大国在应对全球问题方面拥有更强的能力和更多的资源。全球问题影响广泛，没有大国的参与和支持，很难得到妥善处理。二是大国对全球问题通常拥有更高的利益攸关度。大国的经济、人口等规模相对较大，一旦面临全球问题的冲击，往往遭受更大的损失。三是大国自身的问题往往会产生更大的溢出效应，演变为影响广泛的全球性问题。因而，大国治理长期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特征之一。

但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带来的启示是，全球治理存在明显的“木桶效应”，治理的最终成效往往并不是取决于最有能力的或多数国家所付出的努

^① 参见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

^② Hans J.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 Wesley, 1979.

力，而是取决于应对能力最弱的国家怎么做。仅依靠部分国家良好的防控效果并不能让全球疫情彻底消失，只要疫情还在部分国家和地区扩散蔓延，人类就会始终面临新冠疫情的威胁。从一些国家防控疫情暴露的问题来看，既包括自身条件、资源和能力等方面的短板，更包括防控理念和思维上的短板。对于前者，大国虽有优势，但不可能独善其身，而要将其优势转化为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通过国际合作弥补其他国家的短板。对于后者，大国也可能存在明显短板，如果盲目自信，不仅不能使自身免于病毒侵害，还会成为全球威胁的源头。

应对全球问题离不开国际社会每个成员的共同参与。疫情防控表明，仅依靠大国主导、大国参与、大国协调的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紧迫的现实需求，从而为构建全球共治的治理模式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理论前提和实践基础。全球共治理念由来已久，但在全球治理实践中融入共治理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前所未有。当今世界权力并非以“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被越来越多的行为体所共享。^①建构全球共治反映的正是这一趋势和潮流。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治理的讨论越来越强调全球治理的机制改革和以国家为主体的多边共治的集体行动。^②不同于大国治理，全球共治要求全球所有行为体共同参与治理，是全球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共同治理。^③它是建立在多行为体共存的和谐状态基础上的一种调和性理念，以求同存异原则对待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多主体协商民主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④战胜疫情需要全球合作，其他全球问题的解决也都离不开所有行为体的共同努力。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多边主义是全球治理的必然选择，也应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无论是气候变化、移民、大流行病，还是恐怖主义、金融不稳定抑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都需要采取全球性行动。^⑤总之，实现全球共治，就是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⑥

① 关于全球“无极”状态的描述，参见 Richard N.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 S. Dominanc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3, 2008, p. 44-56。

② 陈伟光：《全球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若干问题的思考》，《教学与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53—61 页。

③ 俞正樑、陈玉刚：《全球共治理论初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2 期，第 8—15 页。

④ 高奇琦：《全球共治：中西方世界秩序观的差异及其调和》，《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4 期，第 67—87 页。

⑤ Thomas G. Weiss and Rorden Wilkinson, “Rethinking Global Governance ?Complexity, Authority, Power,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8, No 1, 2014, pp. 207-215.

⑥ 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理论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 年 3 月 27 日，第 3 版。

（三）全球治理制度：功能治理与系统治理

在应对全球问题的过程中，国际社会采取的方法往往是将面临的问题按照所涉领域进行划分，并通过功能性国际组织来整合各方资源和力量，推动全球问题解决。诸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移民组织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红十字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它们都是功能导向的。总体来看，现行全球治理的特点和模式是分议题的功能治理。其优势在于针对某个及其相关的议题，聚集专业力量为国际社会提供专业化的解决方案，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决策提供专业化的应对建议。但在应对系统性危机方面，功能治理的弊端暴露无遗。这也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建立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的主要原因。客观地说，二十国集团反映了全球治理的现实要求，因此是有重要进步意义的新型全球治理机制。但是，二十国集团存在的代表性、执行力、约束力以及机制自身的治理结构等问题使其功能未得到有效发挥。

新冠疫情大流行再次深刻展现了全球治理各个议题之间的高度联动性。当前，全球治理议题的联动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不同议题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例如，当今世界的贸易协定已越来越多地涉及知识产权、劳动者权利、环境保护等问题，甚至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人权、文化等原本与贸易联系甚微的议题也被纳入其中。贸易、投资、金融、援助等经济问题常常被当作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几乎没有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多国发动的贸易战仅是出于解决同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或所谓不公平贸易问题。二是不同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加大。作为公共卫生事件的新冠疫情大流行，不仅导致停工停产、失业增加、收入缩减、经济衰退，还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甚至是军事冲突。^①三是不同议题的应对互为条件。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不仅要解决医疗物资和技术缺乏问题，更要解决经济复苏、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等问题。

因此，现行全球治理制度的问题与弊端是系统性的，仅靠某个功能领域的修补已不可能满足全球治理的现实需求。全球治理各个议题之间的高度联动性既要求各个治理主体和机制进行分工，更要进行高效的相互协作。尽管很多功能领域的国际制度在应对各自领域的问题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在不同议题间联动性明显提升的时代背景下，仍囿于现有资源和力量已越来越

^① 比如，有研究表明，新冠疫情期间政府的封锁措施增加了中东地区的武装冲突。参见 Marius Mehrl and Paul W. Thurner, “The Effe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Global Armed Conflict: Early Evidence”,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 19, No 2, 2020, pp. 286-293.

越难以实现预期的治理效果。正如所谓新木桶效应所描述的那样，即便组装木桶的木板长短一致，但能够装多少水还取决于木板之间的接缝是否紧密。从系统治理出发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制度，就是要坚持以系统观念理解全球治理各议题领域间的互动关系，在整体上认识全球治理的演进规律。对于全球治理改革实践，系统治理要求将全球治理制度改革和建设放在中心位置，不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四）全球治理手段：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

市场与国家的作用问题，一直是全球治理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市场与国家是矛盾的统一体，并不存在天然的对立关系。吉尔平指出，自 16 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后，市场也逐步成为组织经济关系的基本方式。在此后的数百年中，国家与市场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并逐渐成为决定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性质与动力的关键因素。^①从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实践来看，当今世界的西方国家普遍尊崇政府不干预的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倡导自由市场和全球化，并在政治上实行所谓自由民主制度。在其治理逻辑中，市场是一只能够实现自主纠偏和调节的“看不见的手”，从而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②依据市场逻辑，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形成一种“自发的秩序”，而无须政府干预。^③然而，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到当前的新冠疫情大流行，无不反映出西方自由主义所面临的局限和危机。^④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拥有世界先进医疗技术的美国无力阻止陷入疫情冲击的最糟糕境地。这足以说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在应对突发风险时的市场失灵，以及市场失灵时的政府缺位。

新冠疫情大流行加剧了全球化进程中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并推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深刻调整。在市场与国家两种社会组织形式中，国家的作用日益凸显。丹尼·罗德里克指出，疫情之后，市场与国家之间、高度全球化与民族自治之间的关系将得到重新平衡。受疫情后日益高涨的逆全球化思潮影响，新自由主义的吸引力下降，国家而非市场将会重新获得全球化主导

①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 页。

②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27 页。

③ F. A.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A New Statement of the Liberal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Routledge, 2012, pp. 34-52.

④ 西方学者对此已有深刻认识。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弊端及其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关系，参见 David M. Kotz, *The Rise and Fall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21 世纪资本主义的大流行病》作者、罗马大学历史文化与宗教学系教授亚历山德拉·恰蒂尼与巴勒莫大学社会文化系教授马可·A. 皮罗内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深层缺陷。参见李凯旋：《新冠肺炎疫情下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意大利左翼学者访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 年第 4 期，第 150—156 页。

权，并且各国对国家利益的考量将超过全球化带来的收益。^① 迪米特里·叶夫斯塔菲耶夫认为，在新冠疫情后全球竞争的新阶段，国家、跨国公司和其他行为体同处于一个“网络结构”中，未来各参与主体将迈向一种新的平衡。^② 阿列克谢·普什科夫也认为，在疫情之后的世界上，国家的地位势必增强；在保证外部安全、内部法律秩序、医疗和教育等领域，若是缺乏有效运转的政府，任何国家都寸步难行。^③

因此，对于全球治理中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这一基本命题，要跳出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窠臼，并以全新的思维来看待。长期以来，全球治理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主要反映了 20 世纪中叶全球治理逐步兴起时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国内和国际背景。然而，相比半个多世纪前，当今世界已发生巨大变化。比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所讨论的国际市场是一种平行市场，其存续的现实基础是美苏两大集团之间通过确保相互摧毁而达成的心照不宣的和平机制。冷战结束后，人们看到的国际市场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市场，支撑这一市场的是国家构建的国际制度和规则。新冠疫情大流行后，由于客观因素的冲击和主观因素的促动，这种国家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在一些领域正走向“脱钩”。同时，人们也看到，由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角色的强化，当前国际市场的运行出现了高度政治化现象，政府以安全为目的深度参与国际市场的正常交往。要说维护国家安全只是国家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还是说如今人们真的处于一个安全威胁不断加剧的世界，从而需要政府走向全球治理前台，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但可以确定的是，国家内部治理以及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将日益成为影响未来全球治理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人们需要对现有全球治理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加以检视和反思，更好发挥国家与市场作用，发挥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

结 语

新冠疫情大流行在不久的将来或将结束，或将由于病毒毒性大幅降低而

① Dani Rodrik, “Making the Best of a Post-Pandemic World”, Project Syndicate, May 12, 2020,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hree-trends-shaping-post-pandemic-global-economy-by-dani-rodrik-2020-05>.

② Дмитрий Евстафьев: «Пандемия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путь туда, но не обратно», «Эксперт», № 15, 6 апреля 2020 г.

③ Алексей Пушков: «В каком мире мы проснемся завтра –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будущем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после пандем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 100, 13 мая 2020 г.

与人类形成长期共存关系，但无论如何，它都将不可避免地给全球治理带来长期而深远的影响。新冠疫情大流行既推动了全球治理变革，也对全球治理思维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未来更多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将越来越需要以非稳态、系统性和去中心化的思维去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让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未来全球治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诸如严峻的气候变化以及大国地缘战略竞争加剧将给人类带来的风险甚至是灾难。这些此起彼伏、影响广泛的重大突发性事态，越来越难以依托全球治理的传统思维加以应对。

因而，新冠疫情大流行触发了重塑全球治理思维和路径的重大契机。全球治理将逐步回归其兴起时的初心使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基础的全球共治和以各功能领域制度互动为基础的系统治理，并在治理手段上实现市场与国家角色的协同。这些基本逻辑既为构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思路，也将构成全球治理体系演进的重要内容。直面后疫情时代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和挑战，全球治理需要关照全人类共同利益，需要调动国际社会每个成员共同应对。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不能把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也不能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节奏’。”^①这既是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的全球治理方案。

（责任编辑：杨嘉宜）

^① 习近平：《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2021 年 4 月 20 日），《人民日报》，2021 年 4 月 21 日，第 2 版。

FOREIGN AFFAIRS REVIEW

Bimonthly Volume 39 Number 5 2022

Changing Thinking and Reshaping Pathway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XU Xiujun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challenges in the history of global public health,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glob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spher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ich is likely to face more global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needs to break away from the homeostatic thinking that relies on self—regulation, the fragmented thinking that delink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hole and the parts, and the hierarchical thinking that creates artificial differences. Further, it needs to adapt to the non—homeostatic and systemic changes in the future global situation and view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y using decentralized thinking. In this regards, the pandemic provides a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reshape the pathway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terms of value, global governance should move from maintaining Western values to realizing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humankind; in terms of pattern, global governance should move from governance by major powers to global co—governance; in terms of institutions, global governance should move from focusing on functional governance to focusing on systemic governance; in terms of means, global governance should move from focusing on market logic to focusing on the synergy between market and government. These are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choices to orient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oward a more just and reasonable direction, but also comprise the global governance solution contributed by China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 words: the post—pandemic era, global governance, the COVID—19 pandemic,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reat Perception, Security Supply, and the Logic of NATO Expansion

WEI Bing LIU Feng

Abstract: The European region, which maintained overall peace for nearly 30